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述论*

邢向东　庄　佳

提　要：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型方言词典编纂；地点方言词汇、区域方言词汇、特定类词汇的描写与考察；方言词汇比较和特征词研究；方言本字/词源考释和方言词汇历史层次考察；历史文献与方言词汇史研究；与文化语言学、接触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尤其是语保工程中的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研究。以上几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进展显著，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若干热点。在新的语境下，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理论和方法的探究有待深入，研究范式的探索有待加强，以期为中国特色的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新时期　汉语方言　词汇研究　述论

〇　引言

本文的“新时期以来”指1978年以来的历史时期。

汉语方言词汇研究源远流长。西汉扬雄的《方言》用词语和地域比较的方法考察“别国方言”和“古今语”，堪称最早的方言地理学和方言词汇学著作。明清兴起了调查、辑录、考证方言俗语的高潮，出现了《蜀语》《吴下方言考》《新方言》等方言俗语词典以及一系列对《方言》的续补校勘之作。

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方言词汇进行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陆志韦编撰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①]出版。1955年开始全国汉语方言普查，有些省份的调查也有方言词汇的内容。后来产出了《昌黎方言志》（1960）、《汉语方言词汇》（1964）等标志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汉语方言学的繁荣发展，方言词汇的调查描写、比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丁声树（1961）就强调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重要性。关于方言词汇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许宝华（1999）、邢向东（2007）、顾劲松（2014）、谢留文（2019）等做了回顾和思考。

方言词汇研究的进展有两个不同的考察维度。一是从方言学出发，看它对整个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推动作用；一是从汉语词汇学出发，看它对汉语词汇研究的推动作用，观察它在汉语词汇研究史上的地位。这样才能客观系统地估价其进展和意义，预测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取第一个维度，以汉语方言学为视角总结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进展，分析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收稿日期：2022-03-15；定稿日期：2022-05-04。通讯作者：邢向东。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VXK06）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0TS032）资助。

① 由于本文涉及文献较多，未加引述的文献一般不列入参考文献，在文献后注明出版、发表年代。

第2期最终.indd 26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3

一　方言词典的编纂

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方言词典的编纂。

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以来，以《XX方言词汇》为题，刊载了大量单点方言词汇调查成果，涉及汉语各大方言，如熊正辉《南昌方言词汇》（1982—1983）、顾黔《泰兴方言词汇》（1994）、汪平等《宜兴（张渚）方言词汇》（1999—2000）等。此类研究成果除了具有深化地点方言研究、为方言词汇比较提供可靠语料的价值之外，还为从事方言调查的学者提供了词汇调查成果的蓝本，为方言词典编纂做好了前导和准备。

在几位著名语言学家的组织下，几部高水平的大型方言词典相继出版。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1995；第一版 1964）汇集了有代表性的20个方言点的音系和1230条词汇，是方言词汇对照的经典著作。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包括官话和晋语93个方言点的音系、3200多条词语对照及63幅方言地图，全面反映了普通话基础方言词汇的基本面貌。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 1993—2003；综合本 2002）的分卷本共出版42种，收词总数约32万条，综合本收词33万余条，代表了现代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上三部词典的共同特点是，使用统一的调查提纲，获得共时的词汇材料，提供了方言词汇比较的参照系，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用来作为比较的平台，观察某个方言与代表性方言的词汇异同，开展宏观和微观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还有很大的空间。

另一部重要的方言词典是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修订本 2020），原版收录古今南北汉语方言词汇20万余条，修订本收词21万余条，口语和文献材料并重，是横向考察方言词汇的分布地域和纵向考察其历史状况的首选工具书。它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成为江蓝生先生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即出）中收录方言词语、确定流通区域的主要依据。（江蓝生 2022）

同时，大量单点和区域性方言词典相继出版，如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方言词汇》（1991），董绍克、张家芝主编《山东方言词典》（1997），张崇主编《陕西方言词汇集》（2007），张成材《商州方言词汇研究》（2009），张惠英、顾晓东、王洪钟《崇明方言大词典》（2014）等。

一部大型的方言词典就是一种方言的百科全书，从方言文化研究和语言学科发展的需求来看，目前仍然需要编纂一些地域性乃至地点性的大型方言词典，其内容应包含词语所指称的方言文化现象的描写。但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倾向，静下心来深入调查，精心打磨。

伴随着方言词典编纂的实践，学界加强了对方言词典编纂理论、方法、价值的思考和讨论。李荣（1992）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纂为例，详细讨论了方言词汇调查中发音合作人的选取，调查的方法，分地方言词典的引论、出条、注音、释义、举例、用字等问题，是方言词典编写的纲领性文献。一些方言辞书评介类文章也对方言词典的编纂进行了讨论。这对于方言词典编纂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方言词典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方言词汇调查表、调查指导教材等工具书，大大便利了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资料室编《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2003），收词3000余条；（美）史皓元（Simmons, R.V.）、顾黔、石汝杰编著《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2006），包括详

第2期最终.indd 27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3

表、简表、短表三种；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编著《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2015），收词1200条。调查者可以根据调查目的和方言实际，以现有调查表为蓝本修改编制出适合研究目的的词汇调查表。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991）、李如龙《汉语方言调查》（2017）等方言学教材，都突出了方言词汇调查方法的内容，并附有方言词汇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和教材，对方言词汇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二　方言词汇系统的描写

方言词汇系统的描写包括对某地或某区域方言词汇系统的综合研究、特点分析以及特定类词的研究等，目的是揭示方言词汇系统的面貌和内部规律。

2.1　单点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大多数地点方言调查研究著作中都有分类词表。分类词表按照语义分类，如“天文、地理、建筑、日常用具、身体、疾病”等，而不是以方言音系为纲，系统性强，而且实用。分类词表必须包含必要的解释，否则有些词语外地人就看不懂。迄今所见对一个单点方言词汇、俗语加以收集、解释最为详尽的是张津《浑源方言调查研究》（2020），全书294.5万字，解释方言词27338条，俗语8478条，语音、语法也有详细的描写。而且体例完备，附有多种方法的索引。

需要强调的是，分类词表最重要的就是其系统性。现代方言词汇调查与传统方志中对方言俗语的记录，本质的不同就在于，后者只记录少数特殊的方言土语，而我们的目的是反映方言的词汇系统。现在有些方言调查报告，仍然存在这一不足：满足于收集方言中特殊的词语，删略与普通话或权威方言相同的词语，于是出现方言词表中有“爹”没“妈”，有“大舅子”没“小舅子”，有“先后$_{\text{妯娌}}$”没“连襟”的奇怪现象。这是误解了方言词表的作用。方言词汇是一个系统，即使最小的方言词汇表，也应当把这个系统的整体面貌反映出来，比如丁声树先生编制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只有329条词，但系统性很强，它把最核心的词语，成系统地罗列出来，有助于了解该方言词汇最基本的状况，而且能够和其他方言进行比较。如果只搜罗方言特殊词语，别人就无法拿该方言和其他方言作比较，词表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除了分类词表，少数地点方言研究专著有对方言词汇特点的专章分析。如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2000），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2002；增订本 2020），黑维强《绥德方言调查研究》（2016），邢向东主编“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2009—2020）。分析的内容详略不等，主要是本方言与周边方言、普通话的词汇异同，存古性方言词语的考释，特定类词汇的专题研究，等等。

2.2　区域方言词汇综合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开展起来的。这类研究从共时、历时两个平面对一定区域内方言词汇的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共时差异与历时流变、文化蕴含等进行综合考察。如罗昕如（2004）对湘南土话词汇进行综合考察，不仅有特色词、通用型量词、构词词缀的具体分析，还有内部差异、不同来源词汇的历史层次、综合分析等宏观考察，在区域方言词汇研究方面具有首创之功。再如代少若（2020）对湖南境内

第2期最终.indd 28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3

18县19点的赣语方言词汇做了详尽的描写，比较了湘东赣语和湘西南赣语的异同，展现了湖南赣语词汇的整体面貌及内外关系，阐述了作者对有关方言词汇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其他如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2006），邓英树、张一舟主编《四川方言词汇研究》（2010），邵慧君、甘于恩《粤语词汇讲义》（2018），张永哲《关中方言词汇研究》（2020）等。

区域性方言词汇研究的困难在于，方言词汇本身的系统性较弱，开放性较强，区域性研究还没有像方言语音、语法那样，形成有效、成熟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标往往不够明确，基本框架也缺乏一致性。这一点与共同语词汇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事实上，多年以前，关于词汇的系统性问题，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2.3　特定意义、形式类词汇研究

针对方言词汇中的某一类具有特定意义和形式的词语展开调查、研究。如亲属称谓词、方位词、人体词、人物词；具有某种语义特征的词，如小称义名词（包括儿缀词、子缀词、重叠名词、变调词等）；某类结构形式独特的词语，如“圪”头词、分音词、合音词；方言俗语等。《方言》杂志曾连续刊载西南官话地区重叠式名词的论文。这方面的专著如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2007），陈瑶《官话方言方位词研究》（2014），章黎平、解海江《汉语核心人体词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2015）。论文如沈明（2003）论述了山西方言中表达小称义的分音词、“圪”头词、儿缀词、重叠词等形式及其在词汇中的分布和表义特点，邢向东（2020）重点考察了西部官话表名词小称义的AA式、AA儿式、AA子式的分布特点及形成，庄初升（2020、2021）分别论述了客、湘、赣等几大方言中名词后缀“子”“崽”的语音变化、类型与演变。张振兴、邢向东主编《中国濒危语言志·汉语方言系列》（2019）专设“词汇特点”一章，包括“方言词汇的外部比较、特别词、古词语、民俗文化词”等，目的是反映濒危方言在词汇方面的典型特征。

2.4　方言俗语研究

方言俗语包括方言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集中了方言区老百姓的经验、智慧和观念，也有不少方言语音特点、演变的信息，是民间口传文化的结晶。中国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间文艺家协会曾组织编写过分省区的《中国谚语集成》，汇集了历史文献保存及口头流传的方言地区谚语。温端政先后出版《汉语语汇学》（2005）、《语汇答问》（2018）等著作，主张建立以俗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汇学”。张光明、温端政《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2002），吴建生、李淑珍《三晋俗语研究》（2010）等是代表性著作。各地的文化学者也印刷出版了大量记录、解释方言俗语的著作，数量浩繁，难以尽述。

就笔者的方言词汇调查实践来看，“语、词分立”难度较大。尤其是方言惯用语、四字格、部分带有特定标记的词语，实际上是一些词汇构式，归入“词”还是“语”，见仁见智，界限模糊，划分比较困难，划分的理论意义也比较有限。

三　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

新时期以来，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研究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方言词汇异同比较和方言特征词研究理

第2期最终.indd 29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3

论的提出与实践。

3.1 方言词汇异同比较

方言词汇异同的比较研究涉及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不同方言之间在词音、词形、词义、构词、源流等方面的异同比较及差异形成原因的探析。这对认识某地方言词汇的特殊性，探究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及方言分区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推广普通话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新时期以前，汉语方言词汇异同的探讨主要是方、普差异，目的是为推普服务，典型代表如詹伯慧（1958），从形义对应关系、构词、源流等方面比较了方言与普通话词汇的异同。新时期以来，有关问题的讨论逐渐升温，研究目的也从应用为主逐步转向兼顾理论与应用。如李行健（1982）把方言词产生的原因和方式归结为5个类型：突出不同特征式、模仿式、词汇系统制约式、地区生活局限式和古语存留式。李如龙（1982）从源流、意义、构词、价值、音变及形义对应关系等角度归纳了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类型。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2002）是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研究的首部理论著作，从构词、意义和成分三方面比较了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同时探讨差异形成的内外原因、历史嬗变以及方言词汇用字等问题。董绍克等（2013）在前作的基础上，从词汇相似度的计量研究和聚类分析考察了汉语十大方言的亲疏关系，基本上建立起一个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理论框架。

还有学者对方言词汇差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探索。邢向东（2007）举例分析了方言词义差异的复杂情况。赵红梅（2011）用词汇语义学的义位结构论、极化理论、词义范畴理论进行了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的语义比较研究。敖小平（2016）指出词汇的纵横比较要注意的问题，并讨论了区域性方言通用词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考察方言亲缘关系的作用。

新时期发表了许多区域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成果，如陈章太（1994）对北方方言的基本词汇进行了宏观比较，使我们对普通话基础方言内部的词汇差异有了初步的认识，再如鲍厚星《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1985）、贺巍《吴方言词语与官话的差异》（1990）等。专著如涂良军《云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01）、温昌衍《广东客闽粤三大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14）等。

3.2 方言特征词理论

“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李如龙 2001：112）方言特征词研究本质上属于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研究，是新时期方言词汇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对于方言关系及分区标准的探索、汉语词汇史的构建、方言区域历史文化的考察、方言辞书的编纂等具有重要价值。

方言特征词研究有几个方向的源头，都与方言分区有关。陈章太、李如龙（1983），李如龙、陈章太（1985）将基本词汇、语法的比较与语音比较并列起来讨论闽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美）罗杰瑞《汉语概说》（Norman 1995）根据2条音韵特征和8条词汇、语法条件，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话区、中部方言区和南方方言区，这种分区方法和结果，对汉语方言研究意义较大。

李如龙（2001）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概念，并系统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涵义、特点、演化及研究意义和方法。他认为方言特征词按照特征意义的大小及通行范围可以分为三级。张振兴（2000、2004）讨论了“厝、鼎、囝”和“屿”在闽语中的特征词地位，阐述了“宽式特征词”和“严式特征词”的概

第2期最终.indd 30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念和特点，认为方言特征词的选择不宜太过宽泛，其数量往往跟所比较方言地域的大小成反比。赵日新（2002）认为“特征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特征词”指反映本方言特征及区域色彩的词语，相当于方言高频词，“狭义特征词”指对内具有同一性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少数词语。李如龙（2014）以闽方言为例，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基本特征以及频度、结构、语义、语法和用字等方面的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苏新春（2000a、2000b）着重探讨了地域分布统计、构词能力统计、义项统计、使用频率统计这四种方法在方言特征词选取中的运用。唐七元（2010）主张方言特征词研究要以方言同源词的考证为前提，统一选词标准，调整体例安排，以使研究结果更扎实、准确。

在以上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出现了一批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成果。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2002）收录了涉及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徽语的特征词研究文章。刘俐李等《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2007）收录了十大方言区19个方言点的核心词及特征词词表。此书的方言核心词基本采用斯瓦迪士的200词表，特征词根据通行域分为三级，选词数量一般在200—300之间。温州、胶东、陇东的方言特征词研究也有成果产出。

方言特征词研究在理论、实践上还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特征词的选取标准和程序，已有研究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大范围的宏观研究有待于较小范围的方言特征词的微观考察，需要方言学、词汇学的学者加强合作，深入实践。近几年方言特征词研究进展比较缓慢。

在特征词之外，方言高频词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高频词反映方言的基本面貌，构词和构成短语的能力强，使用频率高，往往比较古老，在方言词汇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高频词的长处是概念比较圆融，在理论和范围上不会发生太大的争议。如果将它与文化语言学结合起来，可以凸显方言词汇的文化特征和内涵。比如陕西方言的“嫽好、善合适，好”，陕北晋语的“脑阳平，头、儿蛮不讲理、猴小”，关中方言的“瞎坏、瓜傻、碎小、倥软弱无能；詈词后缀”，都是极高频词，在方言文化的塑造和识别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四　方言本字、词源考释与方言词汇史研究

4.1　方言本字、词源考释

方言本字考释的本质是恢复词语与字形的联系。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本字的考求逐渐走向科学化，多从音、义两方面入手，结合其在一定方言区域内的表现和历史文献记录，考证方言词的早期用字。

李如龙（1988）提出考本字的音韵论证要声韵调都能对应，并且经得起姊妹方言的验证。梅祖麟（1995）把方言本字研究方法分为“觅字法”和“寻音法”。他认为觅字法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有了音韵演变的观念，而寻音法还注重方言音韵层次的区分及方言语法史的探索，更加科学严谨。杨秀芳（2000）提出方言本字考证的“探义”法，重视探究方言字的语义层次和用法发展。以上方法对字形、字音、字义各有侧重。李荣（1997）指出考本字过程中应将书证、古籍与方言相结合，将字形理解和语音论证相结合，方法上可以采用排除法、类推法、比照法。王福堂（2003）认为考证方言本字要从音义两方面入手，结合文献材料来恢复词语和字形的联系，并详述了语音、词义考证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其他讨论如：潘悟云（2002）讨论了虚词考本字的语音对应关系、历史层次划分、特殊音变规则三个因素，从合不从分、语义对语音优先两条原则。潘悟云（2015、2016）提出方言考本字的“觅轨法”，并做了个案研究。

第2期最终.indd 31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与西方的词义词源学不同，汉语方言词源的探求一般从形音义三方面探寻方言词的语源，以揭示词汇的发展演变。方言同源词研究则主要通过历史比较探寻方言词之间的联系，揭示词汇的系统性及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游汝杰（2004：7）详细讨论了判别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八大原则："①应以语音对应规律为基础；②语音对应优于语义对应；③语音对应和语义对应优于方言字字形异同；④方言字形不能作为考证同源词的唯一标准；⑤同源词的词源与方言本字的字义有同也有异；⑥无字词的语音也可能对应；⑦追索同源词应注意择对问题；⑧因借用关系形成的同源词不一定符合语音对应规律。"陈泽平（2000）以福州方言为例，讨论了方言词汇的"同源分化"，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方言词汇中与'四声别义'类似的一字两音各义现象"，如福州话的"抽、听、空、肚、断、禁"，这是词汇孳乳蕃衍而未得到汉字系统的追认；另一种是在保留本源方言词的音义的同时，又从官话借入同源词，如"妈、捞、摸、挖"，"同源词语音形式的分化是方言混杂的结果"。丁邦新（2005）以闽粤语的三个方言词（闽语的"鼎""拍打"、粤语的"睇"）为例，指出方言词汇的时代性、溯源的困难，以及单用词汇作方言分区标准的局限。孙玉文（2016）回顾了方言考本字和求源词的历史，论述了考本字和求源词的意义、学理依据、方法和注意事项，主张追溯方言词历史来源时要区分本字和源词。

新时期方言的本字/词源考释成果丰硕。著作如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1992），林宝卿《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1998），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2004），文章如李荣《吴语本字举例》（1980），乔全生《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考》（2002），马重奇、张凡《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比较考源》（2007—2008），周利芳《内蒙古晋语形容词"牛"[ȵniɔ]》（2016），邢向东《"下数"、"解数"同源考》（2017）等。

方言本字探求和方言词源考释是方言词汇史研究的"一体两翼"，前者主要是寻求方言口语词的早期记录，后者主要是寻求方言口语词的来源。书面上已有的记录不一定反映词源，因此两者之间互有交叉，又有较大的区别。它们都是汉语方言词汇学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4.2　方言词汇层次及动态变化研究

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及动态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方言词汇领域较晚才开始关注这类问题。此类研究一般通过大范围的方言比较、词汇与语音的对应关系透视方言词汇层次及动态变化，探索方言词汇的演变动因及规律。词汇历史层次与动态变化的考察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较早开展方言词汇层次研究的是邢向东等《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2012），该书通过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词汇的比较，认为方言词汇也存在历史层次，提出了方言"底层词"和"上层词"概念。"底层词"是借自语言接触的概念，反映方言早期的词汇状况，"上层词"反映了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张振兴先生在2013年"汉语言文字学讲习班"的报告中，以漳平永福方言为例，论述了方言词汇的"底层词""上层词""表层词"，比邢向东等的词汇层次多了一个"表层词"。周政（2016）运用以上理论观点，分析了陕西安康混合方言区的"底层词""上层词"和"表层词"，以及更为突出的"本源词"和"外来词"。

方言词汇的新老差异往往反映方言词汇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词语本身的更替，也表现为其读音向共同语或权威方言靠拢。至于方言词汇变化的原因，当然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共同语的普及、新旧事物的交替息息相关。新时期是方言词汇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不过相应的研究并不很多。主

第2期最终.indd 32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要原因是方言词汇的变化不如方言语音变化那样更好捕捉，更有系统性，也不如共同语词汇的变化那样引人注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词汇变化的课题太多，令人目不暇接，比如网络词汇、新词新语、新的构式等，吸引了众多词汇学家的注意力。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钱乃荣《上海方言词汇的年龄差异和青少年新词》（1988）、马重奇《海峡两岸闽南方言词汇动态比较研究》（2020）等。

4.3　历史文献与方言词汇史研究

历史文献对于方言词汇史的研究不可或缺。从文献着手可以考察方言词汇的历史状态；与现代方言比较可以探寻其发展演变规律。此类研究往往与训诂学、文献学、近代汉语等学科相结合。

利用历史文献开展方言词汇史的研究，首先要确定方言词语的“祖籍”。在这方面，很容易犯简单比对的错误，即在今方言与古籍之间进行简单比对、联系。如类似“元杂剧中的内蒙古晋语词”之类的考证，就是一例。须知，内蒙古晋语在元代还没有形成，元杂剧中何来它的词语呢？其实，是内蒙古晋语的祖方言继承了一部分元代白话的特点，包括其词汇，后来随着晋语的扩张流播到了内蒙古晋语中。

关于这一点，蒋绍愚（1994：334）指出：“在考察近代汉语作品的方言成分时，绝不能简单地把‘今籍’和‘祖籍’等同起来。”强调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某一方言词语的地域归属确定其在近代汉语中的通行区域。这一原则在讨论近代汉语作品的语言基础时特别重要。如关于《金瓶梅》的方言基础问题，就曾发生过激烈而有趣的讨论。郭作飞（2010）认为历史文献中的方言词汇反映了作品所处时代的语言面貌，其推求要进行现代方言考证和历史还原，研究模式和方法要具有系统性与包容性。

方言词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张海媚《宋元南北官话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21），该书以宋元白话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词形、词义、常用词、特用方言词等角度全面考察中原官话与南北官话相似程度的差异，界定中原官话的地域范围，并联系南北官话方言文献用词的异同，揭示其原因，是构建汉语词汇史、方言史的阶段成果和宝贵资料。

古代方言研究文献、传教士文献、域外汉语文献反映的方言词汇的历史状态及演变研究，成为方言词汇研究中卓有成效的新领域。如《方言》及其后世的注疏、考释，《越谚》等方言文献，《燕语启蒙》等域外汉语教材，近代西方传教士所著福建、厦门等地方言词典中的方言词汇研究都有重要成果问世。

近年来方言词汇史研究出现一个新趋势，就是对近代汉语以来旧方志中方言文献的整理和集成。如华学诚主编，曹小云、曹嫄辑校《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2021）全11册，该书对7000余种旧方志中所见的966种方言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点校，撰写题解，对文献的时间、地域、卷数、版本等作了介绍。辑录的方言文献时间从南宋到1949年，所涉方言包括汉语十大方言。李蓝主编《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2021）全42册，该书共辑录明代至民国600年间742部志书中8376个页面的语言资料，其中第1—29册为汉语方言资料，第30—37册为民族语言资料，还有各种索引等。以上两部《集成》的共同特点是收录宏富，体例完备，查阅方便，成为研究各时代汉语方言（后者包括民族语言）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的重要材料。随着文献集成类资料的陆续出版，将会掀起方言词汇史研究的高潮。

五　方言词汇的跨学科研究

随着各种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兴起、引进和发展，方言学界将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理论、地理语言

第2期最终.indd 33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学等运用到方言词汇研究领域，探索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方法，方言词汇跨学科研究的热度不断提升。

5.1 方言词汇与文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已经提出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研究的重要性，但多年未得到响应。直到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出版，与陈原、陈建民、申小龙等的研究，共同掀起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在文化语言学中，最有成就、学风最扎实的当属方言文化研究。

随着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方言文化的保护、开发成为方言研究的热点，其中的聚焦点是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的交融，口传文化的挖掘、整理、典藏和综合研究。新时期的方言词汇与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方言文化词汇的记录保存，方言词汇与文化的互证互释，以及透过方言词汇对方言地区的历史传承、民风民俗等地域文化加以考察。

侯精一《平遥方言民俗语汇》（1995）首开方言系统记录、解释民俗词汇的先河。侯精一等主编《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10卷，2014），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记录了北京、南京、广州、西安、平遥、汤溪、绩溪、宁远、梅州、揭阳10个代表地区的方言与民俗文化，抓住了方言民俗文化的不断变化与抢救、留存的时间差，“高质量地落实了多角度地科学抢救方言并与抢救地方风俗文化有机结合的全新思路”（王洪君 2019：88）。曹志耘主编《中国语言文化典藏》（2017）作为语保工程成果之一，对中国各地区的语言文化现象进行了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并以“音像图文四位一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此类方言文化研究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对方言文化资源的记录、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示范作用，形成了方言文化资源研究的重要范式。

随着方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方言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探讨应运而生。邢向东（2017：32）提出“语保工程的方言文化调查中应当贯彻五个理念：工程观、系统观、文化观、求真观、精品观”。其中“系统观”强调调查、记录时应关注词音与词义、词语与对象、不同民俗事象之间的有机关联；“文化观”强调要下功夫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求真观”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方言民俗文化记录、保存下来，呈现出来。高峰（2020）对方言文化考察的几种重要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考察，提出“打破方言和文化研究的隔离”，除了“语保工程”中形成的“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模式”，还要探索“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模式”和“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模式”等新途径和新范式。

“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是从亲属称谓、地方名物、地名、熟语、外来词等方言词汇入手，考察方言地区的民风民俗、自然地理、历史移民、生产生活、文化传承等地域文化，或者通过历史文化现象解释方言字词，如刘勋宁（2004）将方言词、民俗现象的考察相结合，借助方言词义和民俗文化意义澄清书面语里不单独使用而比较模糊的字义，其中关于“纣——纣王”“縻——羁縻”的互证，是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的典型案例。“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是针对某一民俗文化现象，从方言词源和民俗来源两方面入手，探求其起源和流变。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芦兰花《湟水流域方言与文化研究》（2017）等方言文化研究专著都包含方言词汇与文化的分析。再如王作新《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2009）、沈昌明《徽州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研究》（2016）等著作，庄初升《从方言词汇看客家民系的历史形成》（1998）、董印其《新疆汉语方言词汇与新疆地域民俗文化》（2002）等论文。

第2期最终.indd 34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5.2　接触视角的方言词汇研究

李如龙（2013：166）指出：“词语是语言接触的最敏感、最容易变异的前沿。”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方言之间的接触，在词汇上都有一定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开展和语言（方言）接触、过渡地区语言事实的挖掘，语言接触研究在方言学界逐渐受到关注。

关于词汇接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陈保亚在《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中已经论及。方欣欣（2008）根据“大三角”和“小三角”的研究思路，提出分析语言接触和词语借用的“三段两合”论。黄小平（2017）提出词汇阶曲线的斜率及其位置的高低可反映接触的深度，可用来考察语言的亲缘关系和接触关系。黄河（2018）基于对宜兴话祖父、外祖父面称的分析，提出了多维接触下词汇扩散的“地缘扩散模型”和“行政辐射模型”，还有一套记录和评估发音人的反应以确定优先形式的调查操作流程。

汉语方言中的外来词研究涉及古今汉语、外国语和民族语言，主要对汉语方言中借词的来源、特点、分布、借用方式及演变规律等进行考察，同时反映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如根据已有研究，陕北晋语的“贼忽拉$_{小偷}$”“翻冒跟/官头$_{翻跟头}$”，都是蒙、汉合璧词。内蒙古地名中的“XX板”，“板”是汉语“百姓”蒙古语译名的返借词。这类词反映了上述地区近现代以来汉语方言同蒙古语之间的密切接触。

其实，汉语中许多外来词在开始借入时都是方言外来词，因此方言外来词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考察借词是从何处“上岸”的，据此可以解释外来词词形的特点。比如，sofa音译成“沙发”反映吴语的特点，音译成“梳化”反映粤语的特点；laser（激光）音译成“莱塞”反映北方话特点，翻译成“镭射”反映粤语特点；著名球星Beckham翻译成“贝克汉姆”是北方话译法，“碧咸”则反映粤语特点。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方言学、词汇学界通力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杰曾经研究过北京话中的满语借词，李作南、李仁孝、道尔吉曾经研究过内蒙古汉语方言中的蒙古语借词。后来的研究如许皓光、刘延新《汉语中的满语借词概述》（1996），廖冬梅《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所体现的语言文化交流》（2005），李作南、李仁孝《内蒙古汉语方言中的返借词》（2007），徐睿渊《19世纪福建厦门方言的借词》（2016）等。

以接触为视角的汉语方言词汇研究，主要涉及方言词汇的借用、扩散、接触程度、接触类型及接触背景下的词汇演变等。周政《安康方言接触层次研究》（2016），罗昕如《湘语在广西境内的接触与演变研究》（2017），瞿建慧、邓婕《湘西乡话的接触与演变研究》（2020）等语言接触研究专著都包含方言词汇的接触分析。文章如练春招《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2000）、胡松柏《赣东北方言词汇接触的表现》（2003）等。

5.3　地理语言学视角的方言词汇研究

地理语言学视角的方言词汇研究集中体现在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2008），其中方言词汇特征图203幅，按意义排列。此外，日本汉语方言学家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2009）和《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2012）也是需要特别提出的重要成果。前者包括方言词汇地图49幅并解释，后者包括方言词汇地图46幅并解释。在讨论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方言词汇研究时，日本方言地理学的影响和贡献不可忽略。

一定区域内的方言词汇研究，最适合运用地理语言学方法，观察代表性词语的分布、语音、语义、指称等及其变化，并据以考察方言之间的关系、方言词汇流播和方言演变的规律。如刘艳（2019）对文水

第2期最终.indd 35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及边界地区方言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其中词汇方面选择时间、昆虫、身体部位、亲属称谓等6组词语，绘制方言地图，在共时平面上重新构拟这些词的演变进程，阐明某些说法的来源，并进一步探究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再如刘艳、（日）岩田礼（2017）运用地理语言学方法考察了山西中部地区方言中亲属称谓词“兄”和“姊”之间的同音冲突现象，并在考察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汉语方言回避同音冲突的几种方法。

六　新时期方言词汇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型方言词典的编纂和合作项目的开展。《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汉语方言地图集》等重大成果，都是在著名语言学家引领下方言学界倾力合作的成果，并因此形成了方言学“一切以事实为准”的优良传统、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合作精神。这种优良传统、问题意识和合作精神，在语保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目前，各省都在编纂《中国语言资源集》，词汇卷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在编纂过程中，仍然需要贯彻这些精神。今后，方言词汇研究需要在深度调查上下功夫，完成几个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张振兴先生曾经多次呼吁，应由方言专家编写省、地级《方言大词典》，这类成果应当指日可待。

第二，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融合的加深。方言词汇调查与民俗文化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不少方言研究著作、方言词典和方言词汇例释类专文中，都收集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有的还对方言词汇中的民俗词条做了详细解释。深化方言词汇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方言文化研究的范式还未形成。方言研究、民俗研究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彼此的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相距较远。如何在结合中深化是最重要的课题。今后需要在实证研究中深入总结、提炼研究范式，与民俗学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除了《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的模式外，在实证研究中构建方言词汇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还须大力提倡和加强。

第三，方言词汇与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词汇的扩散比语音、语法更容易、更灵活，“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方言词汇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能够更直观、切近地反映不同方言文化之间的交汇、交融，反映方言的演变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单独开展方言词汇地理研究的还不多。下一步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考察方言词汇在地理上的扩散和微观演变，进行更为细致的语音变异、语义变化的考察，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也须加强。方言词汇与社会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考察，在日本等国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比如将不同时期的方言特征图或同言线图叠合在一起，同时从空间、时间的角度观察方言特征地理分布的变化。但在我国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

第四，方言词汇史的研究可能取得新突破。各种地方志中方言文献的挖掘整理，以及地名志的整理，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有可能促进方言词汇史研究加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地方志中方言词语的记录固然比较可靠，但也存在对词语来源主观臆断、随意造字乃至志书之间互相抄录等问题，尤其是通过造字记录方言词语、地名中的白读音（如陕北一些方志中将“迸”的白读pie^{53}写成“旻”），容易误导研究者，需要抱持谨慎的态度，仔细分析，不可尽信。

第2期最终.indd 36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第五，加强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汇研究的交流、合作。共同语词汇和方言词汇研究彼此隔离，交流不足，限制了彼此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影响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这方面，汉语语法“普方古”大三角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的形成值得借鉴。词汇学研究应当建立“汉语大词汇史”理念，加强共同语词汇、方言词汇、古代和近代汉语词汇的互动、更替和演变的考察，深化汉语词汇演变规律的探讨和词汇发展史的研究。诚如周荐（2022）所指出的：“汉语词汇学需要深入研究古汉语词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也要注意挖掘中国民间的语言智慧，这是目前的‘汉语词汇学’做得远远不够的。”对于方言词汇研究来说，这一主张同样是适用的。

第六，地方文化学者的调查成果值得关注。许多文化学者和地方文化工作者，长期生活在方言地区，对地方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方言词汇的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记录、出版了不少方言与文化调查的著作。以陕西为例，就有王克明《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2007），杨明芳、杨进《陕北语大词典》（2011），王六（王建领）《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2013）、《陕北回眸：陕北话中话》（2019）、《陕北回眸：信天游说》（2019），熊贞、熊西平、曹文莉《陕西方言词典》（2011），王兆仪《陕北区域方言选释》（2014），丁旭《西安回族方言》（2016），张育丰《陕晋蒙接壤地区俗语例释》（2016），华开锋《旬阳方言词典》（2020）等。这些著作可能在语音标注、词源追溯、方言用字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其中的语料真实、鲜活，例句生动，是对方言文化进行深度研究的宝贵文献，值得学界关注。其实，现代学者经常以古代文人记录的当时方言的一鳞半爪作为方言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今天文人的记录对于后世的价值，亦当如此。

综上所述，新时期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高质量的方言词典，对方言词汇的整体面貌、各方言词汇系统的特点及内部规律、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异、方言词汇的历史层次的考察有了明显的进展，方言词源和历史研究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整个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

在新时代汉语方言学和汉语词汇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中，方言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应当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多出内容扎实、语料翔实的方言词汇描写、实证研究成果，一方面在研究范式、理论方法上努力探索，为建成科学、系统的汉语研究学术体系做出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

参考文献

敖小平（2016）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吴语研究——第八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95）《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北京。

曹志耘主编（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北京。

曹志耘主编（2017）《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商务印书馆，北京。

陈保亚（1996）《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北京。

陈泽平（2000）方言词汇的同源分化，《中国语文》第2期。

陈章太（1994）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第2期。

陈章太、李如龙（1983）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北京。

第2期最终.indd 37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代少若（2020）《湖南赣语词汇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丁邦新（2005）方言词汇的时代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丁声树（1961）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中国语文》第3期。

董绍克（2002）《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董绍克、李 焱、赵红梅（2013）《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方欣欣（2008）《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

高　峰（2020）探索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18日第A03版。

顾劲松（2014）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综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郭作飞（2010）历史文献方言词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前沿》第22期。

侯精一（1995）《平遥方言民俗语汇》，语文出版社，北京。

侯精一、李守业、曹志耘主编（2014）《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语文出版社，北京。

华学诚主编，曹小云、曹嫄辑校（2021）《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中华书局，北京。

黄　河（2018）多维接触与语言扩散模型——基于宜兴话祖父、外祖父面称的词汇表分析，《中国语文》第3期。

黄小平（2017）从阶曲线观察方言词汇的亲缘和接触关系，《方言》第4期。

江蓝生（2022）《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李　蓝主编（2021）《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李　荣（1992）方言词典说略，《方言》第4期。

李　荣（1997）考本字甘苦，《方言》第1期。

李　荣主编（1993—2003）《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综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李如龙（1982）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语文研究》第2期。

李如龙（1988）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语言研究》第1期。

李如龙（2001）论汉语方言特征词，《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李如龙（2013）论语言接触的类型、方式和过程，《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

李如龙（2014）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以闽方言为例，《方言》第2期。

李如龙主编（2002）《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

李如龙、陈章太（1985）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中国语言学报》第二期。

李行健（1982）试论方言词的产生和今后的发展，《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

刘俐李、王洪钟、柏　莹编著（2007）《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凤凰出版社，南京。

刘勋宁（2004）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邢向东主编《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刘　艳（2019）《山西文水及边界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刘　艳、岩田礼（2017）山西中部方言“兄”和“姊”同音冲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罗常培（1950）《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

罗杰瑞（Norman）（1995）《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北京。

罗昕如（2004）《湘南土话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梅祖麟（1995）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第2期最终.indd 38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潘悟云（2002）汉语否定词考源——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中国语文》第4期。

潘悟云（2015）方言考本字“觅轨法”，《方言》第4期。

潘悟云（2016）再论方言考本字“觅轨法”——以现代韵母为u的滞后层为例，《语文研究》第4期。

沈　明（2003）山西方言的小称，《方言》第4期。

苏新春（2000a）论方言特征词的频率选取法，《学术研究》第8期。

苏新春（2000b）词频选取法在方言特征词研究中的运用——“长辈亲属称谓类”方言特征词例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孙玉文（2016）谈谈方言史研究中的考本字和求源词——主要以湖北黄冈话为例，《文献语言学》第二辑。

唐七元（2010）从方言同源词看方言特征词研究，《宜宾学院学报》第11期。

王福堂（2003）方言本字考证说略，《方言》第4期。

王洪君（2019）抢救方言与抢救地方风俗文化——《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读后，《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温端政（2005）《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北京。

温端政（2018）《语汇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

谢留文（2019）汉语方言研究七十年，《方言》第3期。

邢向东（2007）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邢向东（2017）汉语方言文化调查：理念及方法，《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邢向东（2020）西部官话中名词小称形式的分布和类型——兼及动词重叠式的分布，《语言研究》第1期。

邢向东、王临惠、张维佳、李小平（2012）《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许宝华（1999）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方言》第1期。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2020）《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北京。

岩田礼编（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东京。

岩田礼编（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日本好文出版，东京。

杨秀芳（2000）方言本字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汉学研究》第18卷特刊。

游汝杰（2004）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判别原则，《方言》第1期。

詹伯慧（1958）收集和整理汉语方言词汇，《中国语文》第11期。

张海媚（2021）《宋元南北官话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张　津（2020）《浑源方言调查研究》，三晋出版社，太原。

张振兴（2000）闽语及其周边方言，《方言》第1期。

张振兴（2004）闽语特征词举例，《汉语学报》第1期。

张振兴、邢向东主编（2019）《中国濒危语言志·汉语方言系列》，商务印书馆，北京。

赵红梅（2011）《汉语方言词汇语义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赵日新（2002）徽语的特征词，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

周　荐（2022）文化植根深厚 理论择善而从——汉语词汇学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光明日报》3月27日第05版。

周　政（2016）《安康方言接触层次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庄初升（2020）客家方言名词后缀“子”“崽”的类型及其演变，《中国语文》第1期。

庄初升（2021）湘、赣方言与“儿子”义名词相关的后缀，《方言》第1期。

第2期最终.indd 39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

A Review of Studies on Vocabulary of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New Era

XING Xiangdong ZHUANG Ji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era,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vocabulary of Chinese dialects have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in some aspects, including compilation of large-scale dialect dictionaries, descrip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dialect vocabularies in certain locations, areas, and typ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alect vocabularies and characteristic vocabularies, investigations on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words as well as historical layers of dialect vocabularies,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of dialect vocabularies, studies combined with cultural linguistics,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and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especially studies of dialectic vocabulary and folk culture studies in the project of linguistic resource preservation. Such studies achieved a lot, and some notable features and focuse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new context, however, the depth and wid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nly through these improvements could the research on vocabulary of Chinese dialects contribute mo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systems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lexi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era, Chinese dialect, vocabulary research, review

邢向东：710062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xingxd@snnu.edu.cn

庄佳：710062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zhuangjia@snnu.edu.cn

《语言学论丛》期刊创刊号发布会在京举行

2022 年 11 月 4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辑部举办了“迈向更广阔的语言学天地——《语言学论丛》期刊创刊号发布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方言》《民族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部分领导和《语言学论丛》编辑部成员。《语言学论丛》编委、语言学界前辈陆俭明、江蓝生也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深情回顾了《语言学论丛》所走过的 65 年的漫长历程，诚挚表达了对《语言学论丛》转为正式期刊的热烈祝贺和殷切期望，毫无保留地介绍了宝贵的办刊经验，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专家们的发言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办刊热情，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把刊物办好的信心。《语言学论丛》必将把握崭新机遇，继承优良传统，坚持办刊特色，贡献学术精品，迈向更广阔的语言学天地。

（《语言学论丛》编辑部）

第2期最终.indd 40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24